

**幸福感的來龍與去脈：
對教育和國家競爭力的啟示***

**Recent Advancement in the Study of Happines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nd National Com-
petitiveness**

張苙雲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兼任研究員

Ly-Yun Chang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Academia Sinica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為促進跨領域間的對話以凝聚各系所跨領域整合共識，俾建立本院特色，特舉辦一系列社會科學前沿課題論壇，鄭重邀請院內教授擔任論壇引言人，試著就其研究領域的學術生涯回顧、未來發展性以及跨領域結合的可能性等三個面向分享並向全院教師請益，希冀激盪出璀璨的本院發展特色。本文收錄自2012年11月26日，社會科學前沿課題論壇-第三十五場次。

幸福感的來龍與去脈： 對教育和國家競爭力的啓示

張芷雲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兼任研究員

選擇這個題目，與我在八〇年初回台灣，經歷了台灣最為輝煌社會經濟及政治變革，三十年的教學研究而生感觸有關，讓我先從一個秦始皇大哉問開始。去年（2011）出了一本書“*The Longevity Project: Surprising Discoveries For Health And Long Life From The Landmark Eight-decade Study*”，是由Howard Friedman and Leslie Martin兩位教授主筆，歷經八十年的研究報告。這本書提出一個問題：怎樣的人會健康和長壽？什麼樣的人會特別幸福？這個研究計畫的啓動是在1921年由史丹佛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Lewis Terman開始的，簡稱為Terman Project。他當時針對加州1500位大約10、11歲左右資優少年，廣泛地蒐集他們的資料。在Terman教授過世後，其他的研究人員接手，一直追蹤這1500位受訪者，蒐集這些人各式文字或非文字性的資料，資料蒐集非常的詳盡。經過多年後，這些1921年十歲左右的少年人，完成學業、戰爭、成家、進入職場，死亡沒有忘記他們，有些人離世，有些人在2003年時仍然在世。這些包括訃文的豐富的資料，為我們解開秦始皇都想知道的問題。

在為大家解謎之前，先說明與前述研究相關的，我自己在做的四個研究的研究發現。第一個是有關幸福感，用的是台灣社會意向調查資料，進行台灣和香港隨著時間變化趨勢的比較；第二個研究則是使用社會變遷2010年東亞調查資料，並整合香港資料，探討主觀的社會地位對幸福感和自評健康的影響；第三個研究則是整合2010年社會變遷資料、珠三角、以及香港資料，分析少年時的認知能力對成年後幸福感和自評健康的影響；第四個計劃則聚焦在青少年公民規範，用的是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資料。

首先看一下幸福感的長期走勢。台灣資料是從1999年到2009年，我們觀察到這十一年間幸福感一路向下滑。香港則在2001年掉了一下，次年就一路



往上爬升。剛看到這結果的時候覺得很詫異，因為我們回顧幸福感的研究文獻，綜合來看，收入、教育程度、以及國家或地區的所得分配都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所得分配，相對剝削感會影響個人的幸福感。香港是全世界所得分配基尼係數最高的地方有53，台灣在同樣時期大概是32、33左右，所以所得分配看起來也不能合理解釋台灣和香港幸福感的走勢。爲了了解到底甚麼因素影響一個人對自己幸福感的評估，譚康榮教授和我連做了三個研究，得出一個綜合的結論：幸福感三劍客，其中兩劍客涉及個人主觀比較的心理歷程，另一則是個人的品格特質。第一個是公平感，它是一種心理途徑，透過詢問：你的努力跟現在的所得相比，感覺如何？公平嗎？我們分析發現，個人認爲努力和所得相比認爲是公平的人，自覺幸福感愈高；第二個是社會階層結構限制，不管在甚麼樣的社會都有階層結構，有些人在比較高的位置，有些人比較低。我們透過一至十分的階梯問題，自評自己社會位置的高下。在比較東亞四國和香港，我們發現自評社會階層愈高的人，自覺幸福感愈高；教育程度和家庭所得，不盡然在所有國家均對幸福感有顯著的影響。

第三個有點像是人格特質，可是並非天生，而是可以從小養成的一些生活習慣，所表現出來一些做事的特質，即非認知能力，或稱爲軟能力，做爲對應於認知能力。詢問的問題是：在14、15歲還在學校就讀的時候，就算身體不舒服等任何可以留在家裡的理由，我還是會盡量去上學？這是涉及自律；就算是不喜歡的功課，我也會盡全力去做？這是一個責任感的問題；就算功課需要花好長時間才能做完，我仍然會不斷地盡力去做？這是一種耐力和毅力的表現，這是非認知能力三個重要面向。在珠三角、台灣和香港的比較研究中，我們進一步發現公平感對幸福感的影響是獨立的，個人在社會的相對位置會影響幸福感，少年時的非認知能力會直接影響幸福也會影響個人在社會的相對位置，然後間接影響幸福感。對應於公平感、相對位置以及教育和家庭所得綜合起來，少年時的非認知能力的影響力，顯得十分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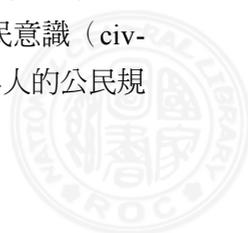
根據這些研究，幸福感是一種長期的心理狀態，不是短期上下起伏的情緒波動，是種悠遊自得、安然自在的心理狀態。但教育程度和家庭所得不盡然在各個東亞國家都影響幸福感，但幸福三劍客卻在所有國家保持顯著且強力的影響。



而各位可能會問我幸福感這些研究發現跟秦始皇的大哉問有甚麼關聯呢？答案是Terman Project的研究結果。Friedman and Martin指出：「大家都知道，長壽的人很幸福，幸福的人比較長壽，這是大家都知道，並不令人意外的發現。可是原因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因為最關鍵的原因是conscientiousness。具有conscientiousness這種人格特質的人，長壽的機會明顯地高」。而conscientiousness指的是什麼呢？它指的是自發性的傾向，表現出自律、負責任、發自內心的成就取向，一絲不苟、誠實可靠。Terman Project進而提出一個重要的推論，一個看重conscientiousness和goal-oriented citizens的社會，這個社會幸福感比較高，也會比較健康長壽。說到這裡，我要特別指出，前述東亞研究中的非認知能力與conscientiousness這個概念有相當程度的重疊。再強調一次，這種人格特質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經由後天訓練而得。

順著這個脈絡，我要做另一個轉折：問到這種自律、負責、誠正、一絲不苟的特質，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普遍嗎？我運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即TEPS）資料來回答。分析的焦點放在後解嚴出生的世代即1988、1989出生的世代。在2003和2006年他們國三和高三時，我們分別蒐集了有關公民規範價值的資料，包括誠正、關懷、責任感、正義感還有共善這幾個概念。問了七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同學在考試時，要求你把答案給他看，你最可能怎麼做？選項有：絕對不給他看、看他是誰來決定、看會不會被發現來決定、看考試的科目來決定、給他看；第二個是：討論畢業旅行地點時，全班絕大部分同學最想去的地方，班上卻有一、二位同學因為經濟或身體上的問題不方便參加，你覺得應該怎麼較好？為了拓寬道路，有人主張砍掉兩旁老樹，也有人主張保留，你的主張是？；班上有位平常對你很不友善的同學被老師錯怪了，只有你知道，你會怎麼做？；你擔任糾察隊負責登記違規，發現好朋友違規了，不過只有你知道，你最可能怎麼做？；來了一隻髒兮兮的流浪狗，你最可能怎麼做？；在學校上完廁所後，剛好發現有間廁所沒沖水，你會怎麼做？這些題目涉及到剛剛的幾個價值。

我把那些答項分成三類公民規範取向，分別是：對公民規範冷漠（civic indifference）、視情況而定（situation contingent），以及具有公民意識（civ-icness or civic mindedness）。研究結果發現，後解嚴這個世代青年人的公民規



範取向有三個重要的特徵：首先，不管是在國三或是高三的時候，他們在公民規範取向上並沒甚麼共識，可以說很多元。第二，他們的公民意識並不高，且到了高三的時候，不太在乎的比例更高，就是對公民規範更爲冷漠，個人取向強。第三，他們不僅表現出公民規範意識不高，而且相當cynical，視情況而定的比例很高。我們進一步透過許多模型分析，檢驗家庭背景、不同學校、同儕、傳媒的影響力。答案是這樣的：父母的教育程度沒有影響、家庭收入有一點點，就是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對於欺騙這一件事會傾向「沒有關係就給他看」，不過整體而言，家庭背景的影響力非常非常小。父母的身教確有影響，即爸爸媽媽公民規範意識越強，孩子也有公民規範意識相。學校有沒有影響呢？除了學校的屬性如公私立或城鄉外，我們還測學校是否是個快樂的地方、是否公平、是否關心學生。結果公私立、城鄉學校之間都只有一點點的影響力，看不出明顯的地方。而三個學校特性的面向都沒有甚麼一致的影響力。同儕的影響力極爲明顯且強烈。綜合而言，當家庭和學校的影響力不大，而同儕影響強烈時，顯示是diffuse media的效果，因爲個人價值的來源，除了家庭、學校和同儕外，就數社會了。青少年所呈現的公民規範價值，顯然強烈地受到台灣社會所瀰漫的一種價值觀左右。

其實，這個推論是很弔詭的，如果青少年和他們的同儕受到廣義的媒介影響，難道他們的父母親不受影響嗎？何況研究的確發現父母身教的作用。我們越仔細思考這結果越覺得有趣。簡單地用兩點說明。第一，我們知道父母親的公民規範取向會影響到他的子女，因此回去看父母親的態度和孩子之間的一致性。我們發現父母親跟小孩非常相似，即父母親也是低公民規範、cynical、個人取向、更多元，兩代之間的公民價值取向非常類似。其中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二個假想情境中，父母親選擇經濟發展的比例較高，而小孩子雖然要經濟發展的比例也有增加，但他會選擇把樹遷移開，即便死亡率偏高（即走中間路線）。而父母和小孩對誠正，都不是那麼認真。很多人可以容忍選舉時賄選，原因可能與個人的政治信仰有關。孩子們在青少年時考試作弊，好像也需要考慮什麼科目，誰問、被逮的風險高不高等。當我們將人放在衝突情境中時，會發現很多價值上的衝突。我個人覺得這是台灣社會一個很深層的矛盾，價值體系是有位階的，例如人際關係高於誠正、盡責、公

義，民主程序高於關懷弱勢等。在需要去衝撞威權體制的年代，民主、自由、人權、多元等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凌駕誠實、正直、負責、和關懷。而解構衝撞後，我們看到孩子們的公民規範價值其實是反映父母輩的公民規範價值，而父母輩的公民規範價值其實呈現的就是我們社會普遍的價值取向（popular cultural practices）。第二，我們發現子女輩比父母輩更為cynical和對公民規範更為冷漠。

這樣的研究發現，似乎在提醒我們這一代父母輩，要很認真的面對自己、問自己，這是我們期待的年輕人嗎？連結前面有關幸福感的研究發現，透過青少年的自律、自重、誠實、負責的走勢，我們似乎可以預期未來台灣社會的幸福指數不會上升，健康與長壽的機會大為受限。

最後，我想分享最近媒體報導在美國、英國和香港社會發生的幾個事件的看法。整體而言，這些發生在美國、英國和香港的事件，無論是當事人或是負責人，他們講話以及回應的方式很乾淨俐落，在價值的光譜上，沒有模糊的空間。美國CIA首長被發現有外遇，他的同事說：I think Dave Petraeus grew up with a code that's very demanding about duty and honor. He violated the code（引自New York Time）。很直接了當，這種回應在台灣社會很難聽到。而英國BBC的總經理George Entwistle上台兩個月，因為新聞報導上的誤失而離職。他要下台的時候說：「我已經決定這個時候最得保有榮的做法是，下台，這個位置（指總經理），我相信他們（指董事會）要找的一定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候選人，而經過這幾天的發展，我想信他們應該另找一位新的領導者。」另外香港有幾個例子，都是有關醫療。首先是港大學校內的診所，被發現器具沒有消毒，而港大校董梁智鴻知道後立即道歉，並立刻成立調查小組，這個調查小組包括學生、職員還有校外人士，整個調查過程透明、公開，報告說得清清楚楚，表現出問責的精神和知錯而改的勇氣，對比的是台大器捐所引發的國際新聞，衛生署及台大的處理。還有一位劉允怡醫師，是中大的醫學院教授，針對醫療美容引發死亡事件，他說：「社會不能接受有人因不必要治療而死亡，認為有需要界定哪些醫療步驟屬於高風險、需由醫護人員進行」，他進而在廣播中清楚地表明醫界應有的專業倫理：「無知和經驗不足均不是醫生開脫罪名的理由」。他講出來的話清清楚楚，沒有模糊空間。最後一個是陳曦齡，因為她

用醫生身分推廣健康產品，香港醫委會清楚判定這屬故意宣傳，專業失當成立，予以刊報譴責。這是官方的譴責，用字遣詞反映香港醫委會捍衛的是醫療專業應有的倫理守則，於此沒有模糊的空間。

透過這些例子我最後要講的是，幸福感三劍客的其中一劍客是Conscientiousness、非認知能力，就是我們在少年時期養成的良好品格和生活習慣，不僅影響到個人在職場的表現，也影到整體社會的未來。TEPS資料所顯示對教育的挑戰在於當今家庭似乎無力養成青少年良好的品格和生活習慣，而學校裡面良好品格和生活習慣的訓練也不是那麼有效，這和社會整個大環境是有關的。這也是系列研究中呈現的diffuse media（當今流行的文化風尚）對個人價值觀的型塑力量。往前推到對國家競爭力的挑戰時，很多企業領袖和各行各業出色的人物，無論是演講或是研究都指出領導者的條件，認知能力很強對成功來說不是關鍵，包括責任感、毅力、一絲不苟、誠正等的非認知能力才是，這也是產業界非常抱怨我們孩子缺乏的部分。簡言之，我覺得這是台灣社會一個深層的矛盾：價值的位階觀，過去在威權體制下，「傳統」帽子下的禮義廉恥，在這價值鬆動、重整的過程中的位置，是相當嚴肅的挑戰。年輕學子的公民規範意識，反的是大社會流行的趨勢。年青學子的品格教育，不僅涉及到我們國家未來幸福感的走向，甚至關係到我們未來國家競爭力。品格的養成，如何在幼年時將誠實正直、認真負責、以及節制自律等公民規範，成為日常生活的習慣，當然跟教育有關。我認為，我們真的非常需要認真的看待和反省，有沒有可能很多新思潮的引介和推廣，已無限上綱到一個地步，反而忽略了國家永續發展所必備品格的養成。

問題一：

這跟modernization theory裡面強調價值和現代性的研究差異在哪裡？第二個問題是，從政治學或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通常會提到這與國家的能力相關，即國家能力要強的話，代表國家的官員素質、能力要能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因此如果說我們這一代或我們下一代都不太在乎公民規範的話，那由他們來主導國家的治理，豈不是會讓我們覺得有點悲觀嗎？



補充問題：

我曾把八期（1990～2007）的社會變遷資料整合在一起，觀察台灣的社團參與。顯現台灣社團參與最興盛的時候大約是在1992年立法院、國會全面改選之際，那一次也大概是台灣野百合之後，然後從那時候就快速的下降，而2000年時則是急速下降，直到2007年才有一點點回升，那今年我相信可能會是下降的。而特殊之處在於別的國家都發現，當高等教育擴張的時候，社團參與率應該是會增加，因為透過理性的公共參與，很多人在關注自己權力時，也會注意政府的效能。那我不知道年輕孩子是不是有這樣的心情？當初進入公共參與是想讓國家的制度提升，但後來才發現沒有辦法監控公共政策。

回答：

社會意向調查裡面有兩個趨勢蠻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公平感，很多當地的社會政策會去影響這個趨勢。另一個是助人，台灣上升、香港也是上升的。另外就是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不太影響小孩子，即小孩子的狀況跟他出生於甚麼樣的家庭其實沒有太多的關係，表示我們是在一個價值被重整、重建的社會。而你提到公務人員素質，其實也包括我們的孩子在進入職場後，有很多價值觀需要調整，這不只是知識上的問題，而是做事情的一絲不苟，這些都涉及到我們國家的競爭力。

問題二：

大家對於長壽的聯想好像應該是好山好水、非資本主義式的競爭，但是包括Terman還有您的研究來看，反而是說具有conscientiousness特質的人比較長壽。然而從經驗上看來，這樣的人不是反而會精神緊繃、憤世嫉俗嗎？另外，我進一步思索Terman的研究，因為美國在20世紀是世界首富，反映出只要願意努力就有收穫，只是場景如果換到台灣或第三世界國家，結論有沒有可能會被修正？

接著提問：

第一個問題，您的分析裡父母、同儕的影響都很大，但我直覺它們很有可能是衝突的，假如父母和同儕方向不一樣時，影響如何產生？第二，我們看出趨勢但也



看到斷裂。在趨勢部分我們可以說父母有持續性的影響，那斷裂是甚麼原因呢？第三Conscientiousness跟長壽有甚麼關係？最後，socialization扮演甚麼角色呢？

回答：

其實Conscientiousness並非指非常敏感的去看待事物，而是指它正面的部分。那它與長壽間的連結機制，可以從Terman的結論來看：「我們看到幸福的人比較快樂，快樂的人比較幸福，中間有很多原因，可能資源比較多、比較會交朋友、比較可靠、誠實等等生活經驗。」至於趨勢，父母與同儕對孩子影響的強度大小大概是0.07v.s.1.7，換句話說我覺得這是大局，因為父母親、同儕都是cultural practice中的一環，所以大家的模式其實很接近。

問題三：

最近普遍不分社會階級對國家整體發展都覺得非常沮喪，那在社會變遷調查中是不是也有相關的變數？比方說，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是不是對國家制度越信任或相反等。另外，國家信賴感的關聯性跟幸福感之間有關係嗎？

回答：

這個問題是我較少處理到的部分，我只能大略的回答。除了公平感之外，我也有把trust擺進去。研究結果是台灣在人和人之間的信任程度方面沒有太多變化，但制度信任有下滑的趨勢。不過我沒有再做更多的分析，所以不曉得現在的狀況是如何。

問題四：

Conscientiousness在經濟學裡面有一個實驗：他們給小孩子糖果，如果你吵的話可以現在拿，不要吵的話，晚一點可以拿兩顆。後來發現願意晚點拿的小孩子，其長期成就會比只拿一顆糖的小孩好，這與張老師研究結果有一點類似。另外，我有點懷疑Conscientiousness與小孩子的家庭沒有關係，會不會是因為父母與小孩的變動程度不同，所以相對上父母的影響比較小？第三，有關香港的公平感是上升而台灣



是下降的情況，我猜想會不會跟社會救助或是福利有關係？最後，因為我本身做醫療，在SARS的時候香港的醫生護士幾乎一個都沒有跑，展現出自己的專業。但我感覺在台灣要做專業非常容易得罪人，這個社會教你的就是見面三分情、要留一點路給人家走。我想這可能跟社會裡勞動報酬所占的比例有關，看是否能跟社會的勞動報酬比例連？因為台灣這幾年勞動報酬所占的比例越來越低，相對上公平感的感受應該也會跟著降低。

回答：

你剛講的是延後滿足，的確它是Conscientiousness或非認知能力裡一個很重要的組成，其對應面是「只要我喜歡沒有甚麼不可以」，而在這兩個之間你會看到它對於人長程的影響來說是一個分岔點。在同儕效應方面，如果從幼童、青少年到成人這三個階段來講，知道幼童時期父母的影響比較大，可是一旦他進入學校之後，外在環境便開始發揮影響力。但父母親的身教仍然扮演一些角色這件事是值得思考的。另外，我show出來的趨勢是幸福感，公平感在台灣與香港之間沒有上下差異，不過我會回去看裡面不同階級組成與勞動報酬率之間的關係。我要特別講在SARS期間我到新加坡去，看到一間自願成爲SARS醫院的自重、自律、專業，可是我覺得台灣還沒有到達那個階段，對應至我在最後給大家看的那張投影片，意涵在於我覺得有些東西已經遺失在我們社會中，那是我們比較需要認真想的。

